

***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 Dongchuan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west China.* By FEI HUANG. Leiden: Brill, 2018. 225pp.**

*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 Dongchuan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west China* 一書探討18世紀地方官員的規劃、各省移民的開發，以及土著與移民的日常互動，直接或間接改變位於今日雲南、四川、貴州交界的東川府的地景與空間運用。本研究的貢獻在於運用多學科地景研究框架，分析歷史文獻與田野觀察中東川人文與地理變化，為讀者展示高原壩子上城市拔地而起，城內／城外、省內／省外的漢人與土著在這片土地上因開礦而涉及的各项活動所帶來的地景改變。本書亦間接呈現地景變化對各群體日常生活的影響。作者在有限的材料中挖掘有別於官方或文人的聲音，讓我們從更多元的角度與更多重的聲音，認識東川地景共構的過程，以及地景背後所象徵的意義。

全書分成10章，由古至今、由宏觀到微觀，一步步帶領讀者經驗東川地景變化。作者認為第五至七章都是探討宗教建築，但筆者認為第七章與第八章的重點聚焦在不同的人群，因此筆者以下對於此書各章的介紹與作者的原有架構略有不同。第一章透過歷代陸路與水路的開發，帶領讀者進出滇川黔的交界地帶；第二章描繪東川一地與周圍高原區壩子的地理特殊性，以及礦業發展帶來的移民與地景轉變；接下來兩章描述帝國力量深入後建立規模不大但具象徵意義的府城，以及文人歌詠讚頌的十景；第五章與第六章是分析地方宗教建築或祭祀對象之於帝國與地方社會的意義；第七章探討方志中孟達／孟琰祠與其相應人群之族群類別變化；而第八章則討論各省會館成為鞏固漢人移民認同的重要機構。

以下簡略展現此書的論據。東川是在清初因豐富銅礦礦藏而被納入版圖的「新疆」。清廷於1699年在東川改土歸流的成功，起因於祿氏家族內鬥，於是土司遺孀主動臣服於清廷以尋求保護，但其下的土目並未臣服，清廷基於銅礦需求大增的動機，在1726至1730年間在當地進行大規模屠殺（頁46-47）。

壩子是人群互動與交會之處。會澤壩子18世紀前是土著種稻之處，之後成為東川行政中心以及漢人移民聚居地。壩子雖是土著大姓與首領的領地，但他們在壩子上播下稻種後便返回山上，待收成時才再下到壩子（頁44）。清政府征服土著首領後，招募土人來耕種，以滿足因建城與礦業發展而前來的各類移民（頁48）。大量湧入的移民，因爭奪農業用地與山區道路而與土著關係緊張；但土著仍願意為外來者提供食物與運輸，因而產生各種互動關

係（頁56-57）。

東川府擁有豐富的銅礦。開採、提煉和運送銅礦，以及鑄造銅幣，不斷地改造與創造出東川的新地景。礦區位於山區，漢人在採礦處進行銅或其他金屬的提煉，而土著則製作木炭幫忙煉礦；政府主要的銅店位於壩子，由地方官員負責管理；鑄幣廠則位於建有圍牆的東川城內（頁54）；最後，清政府透過塘汛的軍事組織來運輸銅礦（頁52）。因此，銅礦把東川府的各種人群連在一起。

東川府城會澤是一座寬僅三里的城市，是清帝國透過中介者（地方官員）推動文明化城市景觀的一環。改土歸流後東川第一次建城是在1700年，當時城牆範圍僅有30丈（99.9公尺）（頁68）。第二次建城在1730年平亂之後，建城期間的花費遠遠超過預算，但對主持其事的地方官員來說，這是在大規模屠殺後有利於地方休養生息的計劃。該城是利用地勢與參考風水來興建的，城南位於翠屏山麓上，而城內外的建築都背山面北（頁74-75）。這樣的選址有其意義，府城的龍脈在城南翠屏山，而山麓上有兩座重要建築：城內的城隍廟與城外的孔廟，均象徵帝國對地方的控制與開化邊疆的期望（頁81）。

在東川府城建立後選定與記錄的東川十景，具政治、軍事、商業與風水意涵。十景的認定代表着帝國代理人——文人官員透過選景、定景與頌景，將不受控的邊疆異地變成有秩序的帝國一隅。地方文人官員為了讚詠邊疆景觀，必須運用一些標準化符號與文學典故來命名與作詩，例如東川的「金鐘夕照」呼應北京的「金臺西照」（頁95）。標準化格式有助於將「異」轉為「同」。十景的選定雖然帶有政治的象徵意義，但仔細分析實景分佈方位，十景中有六景都在城西外，在開礦要地與礦業運輸路線上（頁106-108），顯示濃厚的經濟意涵。

宗教建築反映出東川政經情況與各族群、階層的多重歷史記憶與生活經驗。城北龍山上有泉水、岩洞與鐘乳石，被視為仙境或風水寶地。山上青龍寺有真武像，估計是隨清軍帶入的漢人信仰（頁118）。山腳下曾有座祿氏宗祠，是土著祭祖之地（頁128）。土著與移民每年農曆三月初三都到青龍寺祭祀，雖各自崇拜不同的神靈，卻顯示土／漢信仰共存的事實。城西龍潭廟是地方官員在泉邊求雨成功後興建的，但重建龍潭寺的記錄完全不提及土著信仰。

文昌廟的興建與儀式活動，反映當地不同政經地位人群的生活經驗與人生理想。18世紀中葉，地方官員在城西南之金鐘山興建文昌廟建築群，但地方考生的表現仍不佳；相隔十多年後，知州在城東北華宜寨另建一文昌廟。

本以為新廟的好風水必能增加學子文運，然而地方文風卻因開礦事業而不盛。地方傳說中，挖泥寨（華宜寨）的文昌廟（東宮）先於金鐘山的文昌廟（西宮）興建，支持東宮廟會的城內的居民稱「彝甲」，而支持西宮廟會的稱「漢甲」。

18世紀東川人群具多元與變動性，族群或省級認同會因為現實處境而改變。地方志對金鐘山下一處聖地所連結的人物與其後代有相反的解釋：1735年版本記載地方十姓是漢人後代，祭祀孟達祠，孟達是跟土著祿氏家族的攝賽有婚外情的漢人官員；而1761年版本卻認為蜀漢時臣服於諸葛亮的土著首領孟琰，才是該聖地的主人，十姓原是土人，但被給予漢姓並形成漢人社區。「真假」漢人或土著的認同或區辨，顯示投資開礦失敗的漢人必須在當地婚配土著婦女的現實，其後代強調土著身份是逃避繳稅的策略。而透過重修會館的記錄，看到經商成功或移動能力較強的漢人透過會館來保持原鄉的認同與連結。

作者運用文獻與田野材料呈現東川地景的變化過程。東川府城隨礦業興衰而大起大落，今日破舊的山城很難連結到18世紀因開礦而帶來的繁榮景象（頁55）。作者利用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資料，拼湊出鮮活且具人氣的東川城。資料包括正史、地方志、族譜、廟碑、墓碑、帳簿、鄉野檔案、民間傳說、口述史、神話、訪談與田野調查資料，等等。該研究更重視地圖與地理資訊的資料與方法。作者為深入理解這個大起大落的山城挖掘各種材料，在材料的使用與方法的運用上深具新意。

本書若能增加關於底層移民與土著日常生活篇幅，必能加深讀者對滇東北地景變化的認識。若如作者所定義的，「地景的出現是一種文化過程（Landscape then emerges as a cultural process）」（頁8），是人類參與而創造與改變了地景，那麼作者若對地方人群有更多的著墨，則讀者對18世紀東川各階層與各族屬的人群透過日常生活的參與和互動、進而塑造地景的過程會有更鮮活的印象。不過，研究底層移民或土著的困難在於缺乏文字資料，因此作者採取以地景為主，再側面對參與地景創造與改造人群加以描述，是合理的策略。作者另外一篇文章“Between Hills and Valleys: Contesting the Bazi Landscape,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in Southwestern China (1700-1900)”（*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51:2 [2017]: 257-282），討論兩造爭奪土地的官司，可以幫助讀者對當地土著與移民間的互動有更近一步的了解。

建議作者多加一章或一節描述東川採礦業的衰落與伴隨而來的地景衰敗過程，才算對東川地景的變化有相對完整的交代。雖然地景的創造是一個過

程，並沒有一個具體始末的時間點，但本書不談19世紀東川的樣貌，卻又描述田野觀察下當地21世紀的地景，因此從18世紀末到21世紀初之間，出現斷裂。筆者認為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作者書名直道出本書面對18世紀的東川，多一章節交代19世紀的東川，可能顯得名實不符；此外，作者以商人會館作為最後一章，或許要留給讀者更多的想像與期待；或許東川的衰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值得再撰一專書詳述；亦或許19世紀的資料闕如，不足以單章的篇幅描述。

總而言之，此書運用多學科視角，分析中國西南邊疆各種人群與階層參與地景和空間創造與再造之動態過程，值得推薦給對中國西南歷史學、人類學與人文地理有興趣的研究者。研究者藉由此書可以深切認識在歷史文獻檔案與社區田野調查之外，地景變化與地理資訊作為資料或分析方法，應是區域史、社會史與社區研究不可忽略的一環。

高雅寧

臺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Religious and Ethnic Revival in a Chinese minority: The Bai People of Southwest China*, By YONGJIA LIANG. London: Routledge, 2018. 176 pp.**

*Religious and Ethnic Revival in a Chinese minority: The Bai People of Southwest China* (《一個中國少數民族的宗教和民族復興：中國西南的白族》)是梁永佳根據其在雲南大理喜洲鎮的田野調查寫作而成的專著。以喜洲鎮的兩性社會組織為着眼點，作者探討當地的宗教、族群、歷史、傳統的實踐與信仰等問題。喜洲鎮曾是許烺光的田野點，許烺光根據在這地區調查所得的資料完成《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許烺光著，王芃、徐隆德譯，臺北：南天書局，2001)一書。受梁漱溟提出的土地流轉市場和利奇(E. Leach)的社會動態論等理論的影響，梁永佳認為許烺光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因此，當他以歷史和動態的眼光來思考喜洲鎮的特徵時，呈現出與許烺光的調查不同的面貌。梁永佳認為，宗教和族群(ethnicity)不僅是喜洲鎮的兩個支配性問題，也是國家的兩個支配性問題。考慮到1950至1960年代和1990年代至今這兩個歷史時期對中國歷史的重要影